



共产党人要有什么样的修养

——重温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 丁俊萍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的演讲，收录在《刘少奇选集》上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篇文献“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新征程上，重温这篇文献，对于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强修养

刘少奇首先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论述了共产党员进行思想意识修养的必要性。他指出，“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应当在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求得自己的进步，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质和能力”。

无论何时，共产党员的修养都是十分重要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刘少奇指出，一些党员“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他强调，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而不是剥削别人的无产阶级，它能够使革命进行到底，从人类社会中消灭一切剥削，清除一切腐化、堕落现象。

象。“它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国家机关，经过这样的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来和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地从党内和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腐化、堕落的分子（不管这种分子是作了多大的‘官’），而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鲜明特点。我们的党员必须清楚了解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

共产党员要在“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

共产党员要注重哪些方面的修养？刘少奇从科学理论武装、政治能力锻炼、思想品德淬炼、纪律观念加强、优良作风养成、群众路线贯彻以及学习本领提升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他指出：“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这些党员修养的内容，也同党章对合格共产党员的要求相一致。

共产党员不能像古代一些人那样进行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也就是说，共产党员提升修养的方法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它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反对理论和实践的脱离。“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

高贵的无产阶级的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

“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关于共产党员提升修养的具体办法，刘少奇特别强调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他指出，虽然我们大多数的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不能达到十分高深和渊博，但是“我们同志只要真正有决心，真正自觉地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岗位，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始终不脱离当前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运动，努力学习、锻炼和修养，那末，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工作和斗争中培养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这是完全可能的”。刘少奇引用《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鼓励每个共产党员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

如何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刘少奇批评了肤浅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以背诵个别原理和结论而自满的错误态度，强调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去检查自己处事、处人、处己是否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

切的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自己。

除了强调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刘少奇还指出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对于加强党员修养的重要性：“共产党员不能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只有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以无产阶级的理想为理想的人，才能彻底了解和掌握它。“一切具有坚定而纯洁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一切没有任何个人成见和其他不干净的东西的同志，只要虚心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切实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他们在观察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一定会比其他同志更敏捷而正确。”一方面，“一个共产党员要有比较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就必须有崇高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另一方面，一个党员只有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才能在一切实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并在情况复杂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都能够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都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今天，重温这篇文献，能够获得诸多启示。当前，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为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仍然需要每个党员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我们要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开拓创新的的精神状态和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不断提高履职尽责能力和水平，勇于担当，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增强干部作风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干部教育研究》2025年第三期

□ 薛景文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加强作风建设，把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把作风教育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来抓。《干部教育研究》2025年第3期“特别策划”栏目聚焦“加强干部作风教育”，特约专家学者撰文探讨，为进一步增强作风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出建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优良作风赢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持之以恒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在开展作风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加强干部作风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等在《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教育的经验启示》中总结提出，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高度强化作风教育，把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作为加强作风教育的着力点，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新时代作风教育的突破口，是党开展作风教育的宝贵经验。

提炼升华关于党的作风教育的规律性认识，对于加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赵绪生在《准确把握党的作风教育规律性》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作风教育成效显著，深化了我们对新形势下党的作风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文章概括总结了对党的作风教育的五条规律性认识，包括坚持抓作风教育和惩治不正之风相结合、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教育“绝大多数”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党内自我教育和搞“开门教育”相结合、作风教育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

把握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是加强干部作风教育的内在要求。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王纪刚在《干部作风教育的问题导向与实践路径》中梳理了当前作风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即“内化”上思想铸魂有差距，“转化”上自觉省思不到位，“外化”上成果运用没有完全彰显，开展作风教育考核评估“细化”“实化”不够等。文章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系统实践路径：以铸魂为重点，强化理论武装；以问题为导向，创新方式方法；

以实践为目标，构建全周期培训模式。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长期性、复杂性，绝不能有松松劲、歇歇脚的心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改进作风问题上，“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原副院长刘靖北等在《健全完善干部作风教育的长效机制》中提出，必须始终将党的作风教育作为干部教育的必修课程，不断建立健全完善干部作风教育的长效机制，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提供重要保障。为此，一方面要坚持把党的作风教育作为干部教育的必修课程，坚持不懈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理论教育，加强党的优良作风历史教育，修好共产党人的党性“心学”，开展党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另一方面要健全完善干部作风教育的组织保障机制，构建干部作风教育的责任机制，丰富干部作风教育的载体和形式，推进干部作风教育信息化智能化。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扫码关注《干部教育研究》公众号

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中国的精神”

——读德克·卜德《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

□ 吴原元



德克·卜德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1931年至1937年，他受哈佛燕京学社的委派在北京访学6年，对这段生活经历印象深刻；1948年夏，他再次来北京访学1年。此次重返北京，卜德不仅“有一种回老家般的感受”，更因此机缘得以亲历与见证彼时中国正发生的巨变。他这样写道：“那年夏天，当我们从美国启程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相信在北京的这一年，我们将看到一场伟大的新世纪的开创，这个开创将不仅改变中国，也会改变世界。”在《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一书中，卜德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他所亲历的“新世纪的开创”。

“共产党取得了非凡的胜利”

当卜德于1948年8月刚到达北京时，他发现“北京的贫困是相当明显的。既有物质上的贫困，也有精神上的贫困”。令其印象深刻的，是由于彼时正值国民党政府为挽救经济崩溃而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他对改革所带来的“富有戏剧色彩的通货膨胀”有着切身的感受，并在随后的5个月中日睹国民党政权的种种腐败，以及“整个旧生活方式的解体”。对于这段时间的感受，他如此写道：“人们的心情普遍是忧郁、紧张和不安。”

1949年1月，解放军和平入驻北京，新政权的活力与生机日益显现出来。在日记中，卜德对于共产党重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的努力表示了赞叹。比如他提到，有关婚姻自由的宣传教育，“表现出共产党十分重视妇女获得平等权利的问题”；组织工业合作社，是“穷人通向新生活的道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表明共产党“是真的想听取意见的”。

1949年6月26日，卜德来到公园散步，发现路上的行人“全没有我们刚到北京的那六个月中所看到的那种紧张不安的神色”，他们“随时想笑，想唱（新的歌曲相当流行），想自由自在地与人交谈，他们又重新拥有了那份无忧无虑，那份亲切友好的心情”。他们“从那种恐慌不安中解脱出来了，而且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在卜德看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将社会导向安定、团结，并使大多数的北京人“都洋溢着一种获得新生活后的

希望和乐观”，共产党确实“取得了非凡的胜利”。

“点燃了一把热烈的理想主义火焰”

1949年3月17日，卜德在日记中记录下他在北海散步时所见的一幕：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发现倒地的香炉后，随即叫来同伴合力把这三英尺高的“既圆滑又笨重”的香炉扶回原位。对此，卜德感慨道：这也许是几十年来，一队中国士兵，在不期望得到表扬和奖励的情况下，“只是为了扶正公共古迹所自发地表现出来的需要有积极努力、机智和合作精神的行动”。卜德由此窥见了一种精神，他将其称为“新中国的精神”。

正是这种“新中国的精神”，使共产党能够取得非凡的胜利。共产党接管北京后，面对的是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与挑战，比如崩溃的经济、严重的粮食饥荒、资金与技术人才的缺乏等。不少人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接管的前景心生疑虑，甚至有人建议“共产党也许应该接受劝告留在华北1至2年，以巩固他们的政权”。卜德认为，这类观点看似“有许多事实根据”，但忽视了“许多别的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精神”。

卜德在日记中虽未解释“新中国的精神”的具体内涵，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精神方面为中国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否认更是不容忽视的：“从精神方面，共产党为中国作出什么贡献呢？依我看，共产党都作出了贡献，而且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加强纪律教育，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对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树立信心，为共同的目标而通力合作，个人对社会福利的关注，提高老百姓的政治觉悟，对知识分子进行关心和尊重普通老百姓的教育，对公务员的反贪廉政教育，取消

公务员的特权，这些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正是基于此，卜德称共产党的这种精神“为他们的事业点燃了一把热烈的理想主义火焰”。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有这种力量的组织”

卜德曾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较为精深的研究。基于研究，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理想化的、静止不变的‘和谐’基础上的”。源于此，“中国应该从她的古老的条条框框中挣脱出来”。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具有使中国摆脱古老条框的“这种力量组织”，而其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作为唯一的和最终的真理”。卜德阅读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感慨

道：“这段论述是一个清楚的、令人信服的、充满活力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正是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为唯一和最终的真理”这种信念，使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品质：热情、无私奉献、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关注、理想主义、廉正以及准备克服一切困难的意愿”。

彼时，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进行了抹黑，他们当时流行的观点是“莫斯科应该对在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负有直接的责任”，或是“如果美国既给国民党更多的援助又不‘出卖’蒋介石的话，那么形势就可能扭转”，抑或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并非靠的是其本身创造性的品质，而纯粹靠的是对手的错误和缺点”。卜德严肃批评了这些观点：“任何对本书所阐述的事实能认真思考的人”都可清楚地看到它们的“荒谬之处”。基于在中国的亲历与耳闻目睹，他提醒美国社会各界必须承认“国民党时代已过去了”，“由于它的贪婪、腐败、玩世不恭、冷漠、愚蠢及脱离老百姓，国民党已最终失去了曾经拥有过的老百姓的支持。而共产党在这些方面正好恰恰相反，所以他们就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

与此同时，卜德还发出警告称，如果不正视“共产主义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内在原因，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品质”，只是“试图用武力来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其结果只会是徒劳。鉴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将在其自身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以其特有的方式向前发展”，他呼吁美国应努力去做和当时中国的新政权进行交流，并称这值得“坦率真诚地去试一试”。